

中西问题比较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策略说

□ 陈 军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学界围绕中国文论话语建构话题的成果是纷纭琳琅,或就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总体原则建言献策,或就某具体西方文论流派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实际影响作细部考察,或就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路径作实际个案的探索,或就中国文论及其与西方文论关系作本体论阐述,或反思中国文论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而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提供借鉴。诸如此类,都为当前继续探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奠定了较为充实的理论参考基础。

当前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探讨之反思与不足:第一,前提论证多于方法探寻。不论处于哪一种境地,本民族、本国度的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都是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命题,只有建构了这一话语体系,方可参与国际话语交流与互动,彰显民族活力与自信,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亦然。可是反观一些相关成果,仍是拘囿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必要性、可能性等方面,一而再地论证为什么建构的前提,老生常谈,难觅新意,流于重要性的重复强调。而对究竟如何整合融通先秦至今的中国文论遗产思考不够,琢磨不深,方法不多,碰撞不足,导致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研究不时给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印象,阻碍了正常应有的学术进程。第二,立场纠结多于自我认知。对待中国问题不可也不能离开世界眼光。此间不应该是孰优孰劣、孰高孰下的偏狭性价值判断,更多的应该是交流互鉴、融合并进的开放性对话关系。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从属于全人类对于文论话语建构总体系,而不应该陷于自我中心主义或民族原教旨主义。离开世界视野大谈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是一个伪命题。第三,宏观指导多于微观实践。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既是一种理论研究,更是一项实践性强的学术工程,探讨必须以实践为旨归,外部研究必须尽快转向内部研究和微观实践,切实开展好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宏观层面关于为什么建构、建构的意义何在、如何处理中外文论之间关系之类,不是不重要,而是说宏观层面的探讨都是为了指导微观实践层面

的具体开展,服务于实践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杨明照、季羨林两位先生在二三十年前曾分别撰文《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针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及其必要性、基本立场等发表了卓有见地的意见,高瞻远瞩,实事求是,振聋发聩,重读之感慨宛同昨日眼前之事,足可窥见加速改进当下建构研究现状之急迫性。

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命题的提出背后蕴藏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作为一个拥有五六千年辉煌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文论资源自是构成其灿烂而博大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对自身文论传统的挖掘、整理、总结与归纳、提升,使之进一步体系化,本身就是一项时代使命。同时,中国文论自身的体大精深、纷繁复杂也有待自我消化,自我厘清,才能更好地发展传承与转换创新。客观、科学、全面认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原因,有助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建构之核心要务,有助于提升建构之自觉,有助于建立对于建构之复杂与困难程度的准确全面的估计。

要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对象范围建立正确认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既包括古代文论、近现代文论、当代文论等各个历史阶段文论资源的整理与研究,更包括针对如许文论总资源进行去芜存菁的辩证反思,汇聚精华,钩沉机理,深度探究,在交流互动中求同存异,在碰撞论争中淬炼特色,共同打造人类文论话语知识共同体。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对象范围的正确认识,有助于统一各学术领域的建构反思步伐,分工合作,齐心协力,殊途同归,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完成建构工程。

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研究重在建构,旨归在建构,评价标准亦在建构。外围性的建构前提论证和宏观指导原则的探究越多,反映出的则是对于中国自身文论资源复杂精深性的退舍与回避。中国文论资源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复杂程度世无其双,这就决定了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两重困难。

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绝非一日之功,必须要有持久战准备,建构之路任重道远。外国文论绝非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障碍,切实领会外国文论真谛,也有助于我们以更加科学全面的眼光审视和建构自身的文论遗产,强化我们建构的学术自觉程度,以进一步提高建构的质量和水平。重在建构这一宗旨的确立,有助于我们调整重心,凝聚力量,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气概,稳步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进程。

所谓中西问题比较研究,是指围绕中西语境下的同一个问题或命题展开的异同比较研究。之所以将中西问题比较研究作为当下开展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策略选择,是由于下列因素决定的:第一,中国文论相对于西方文论所处劣势位置。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严峻事实是,在中西文论交流甚或中国与欧美一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上,严重不平衡的逆差现象长期且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一切基于这样定位的认识和结论,才是实事求是,客观科学的,否则都是超越或脱离客观事实的。设若认可这样的失衡逆差事实,那么所谓“失语症”就是发展过程之中的一种必然,是必须要经历的中西文论交流互动过程中的阶段现象,不可逾越。而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则是,如何尽快从“失语”的盲从与追随中求得突破,进入跟跑状态,为将来的并跑和超越积蓄力量。我们必须“同”字当头,尊重西方文论的优势地位,以中西文论中的共同问题和命题寻求中西文论之间平等对话的契机,从而赢得跟跑、伴跑的角色转换。换言之,借助问题比较,使得西方文论有意愿、有兴趣与我们开展交流对话,以期改善我们长期失语的不利局面。第二,中西问题比较有助于搭建沟通交流的有效平台。在中西文论互动过程中,简单地以西释中或以中证西、以中补西,皆长期受到诟病,最大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中西方文论各自的主体地位,导致交流不平等,结论难免存在削足适履、机械套用、强制阐释之弊,大大降低了中西文论对话交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而使得比较诗学研究常常处于非常尴尬的窘境。而问题比较则较好弥合了中西文论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方便搭建平等对话平台。不仅如此,问题比较还提供了问题或命题这样科学有效的具体抓手,也从比较对象上保证了比较诗学研究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第三,中西问题比较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目标任务相向而行。以问题和命题切入对于文论资源的梳理与挖掘,凭借基本问题和命题自身的基础性、渗透性、辐射性,实现贯通古今中外,提纲挈领地覆盖文论全部。问题比较还鲜明体现出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对话交流策略,因为中西文论之间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说,问题比较的结果就势必触及问题之异。问题比较决定了中西文论之间的可对话性、趋同性,而同中之异

则必将揭示出中西文论之间的区别特质及其背后表征的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可以说,同题之同,首先让中西文论能够淡对悬殊,走到一起,开启对话交流;而同中之异,则是让中西文论最终真正实现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不难想见,众多问题之网结,必将编织出一幅五彩斑斓、璀璨夺目的多元世界文论新图画。第四,中西问题比较研究符合时代发展的精细化研究趋向。过去常说学术研究倡导小题大做,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云处理时代的到来,小题大做不仅仅只是一种倡导,而是势在必行。精细化比较研究就是大数据时代下的小题大做,“细”是对研究对象选择的要求,越具体、越基础、越具有可比较性;“精”是对于研究深度和视野广度的要求,研究必须直接接触及研究对象背后各自深藏的民族基因。而同题比较立足基本问题或命题展开,其宗旨正与精细化比较研究的精神相契合。

中西问题比较研究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一种策略选择,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当前某些研究已经对此有所践行,例如“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研究,“以关键词为切入点,将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进行比较辨析,以期发现其在不同理论语境中的异同”,“作为走出当代我国文论困境重要思路”来试图解决中西文论之间的融通对话问题,从而为创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当代我国文艺理论话语新体系准备好条件。又如李春青教授围绕“意境”范畴,研究认为不能把“意境”范畴完全视为舶来品,并以宗白华先生的意境论学说为例,论证了“意境”说在中国文论传统背景下的独特而深厚的理论资源。诸如此类的研究,纵横捭阖,鞭辟入里,别具一格,显示出中西问题比较强有力的学术之魅。其他在诸如美是什么、美的特征、美与善的关系、审美教育与人的物化、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陌生化手法、审美自由、典型人物、灵感、文学起源、诗乐画之别、诗史之辨、童心说、自然美与艺术美优劣论、文艺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等一系列命题上,中西文论都有异同交错、各见其彩、相映生辉的共鸣或碰撞,有待逐一予以比较检视,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文论话语做好全面厚实的铺垫与积累。

中西问题比较作为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在现阶段上的一种策略选择,是审时度势,综合多方面因素谨慎作出的路径考虑。行百里者半九十,问题比较离不开在熟稔中西文论全部主要家底的基础上遴选出问题比较的目录,离不开研究者全面学养的有力支撑,离不开对比较结果尤其是同中之异的深度分析与精炼融通。我们有理由相信,一道道问题比较,如同一块又一块的坚实基石,必将引导我们走向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美好明天!

■ 《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约9000字